

# 日常生活是写作的水土

——专访作家金仁顺 □本报记者 许婉霓



记者：2012年，您的长篇小说《春香》获得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春香》与朝鲜族民间故事《春香传》有关系吗？《春香》的创作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金仁顺：《春香传》流传了300多年，是朝鲜半岛最著名的民间故事，里面有浪漫的男女恋爱，也有围绕着贞洁烈女产生的三角关系，故事动人，三观传统。我后来看过朝鲜拍的歌舞片《春香传》和韩国拍的盘瑟偃版的《春香传》，导演们努力寻找着新形式，但瓶子再新，里面装的仍是旧酒，故事的内核是男尊女卑，女人是男人的附属，为男人奉献一切，得到幸福的唯一出路是耐心等待男人的救援。我最初写《春香》是怀着对这个民间传说的不服气，是一种游戏的心态——为什么春香一定要等着李梦龙来解救？为什么传奇不能是人为制造的？女人们独自生活，为什么不能更好、更快乐、更自由？在我的小说里面，我关注春香如何出生，怎么长大成人，什么人和什么事情曾对她产生影响，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使她最终变成了传奇。我要写民间故事里面没有的那些点点滴滴，柴米油盐。故事越来越长，也越来越认真，我颠覆了原来的故事。如果改掉三个主人公名字的话，这部小说几乎和《春香传》没有什么关系了。但这本小说仍旧还是《春香》，只是它是我个人的“春香”，不是广义意义上的“传”了。

记者：其实，除了《春香》外，您还有不少小说是关于朝鲜族的，比如《高丽往事》《桔梗谣》《云雀》《城春草木深》等。您在处理少数民族题材时，多将其置于历史时空中，您是如何看待少数民族题材与历史和当下的关

系的？

金仁顺：我的古典题材写作是架空文，和真实的历史时空、人事没有半毛钱关系。我写历史小说的唯一理由是这些故事放在当下时空不合适。比如说小说《盘瑟偃》，我想写一个女儿弑父的故事，但我不想让她为此担起全部责任，也不想把这个故事仅仅写成悬疑案件。这在法制社会实现起来太难了，至少会变得复杂、晦暗，而我要的是明亮和简单。所以我就把故事架空到了古代朝鲜半岛，这篇小说才5000字，但将男人的酗酒、薄凉、自私，和女性的悲苦、无助、被摧残都推到了极致，同时又是符合当时朝鲜社会真实情形的。小说是写人性，而千百年来，人性没什么大变化，所以小说背景是历史还是当下，没那么重要。

记者：感觉您这类题材的写作节奏较为舒缓，区别于其他当下题材。在不同的题材上，关于叙事节奏与腔调，您有什么讲究吗？

金仁顺：我想说明一点，这里的区别主要是在古典题材和当下题材上，而非关于朝鲜族题材。

写作古典题材时，我的叙述的确会放缓，像一首古老民谣，慢慢哼唱起来，我会很有耐心地描写一些生活细节；但处理当下题材时，我会减少很多闲笔，在很多空间和时间的描述上，读者和作家是同一个维度，能一句话讲清楚的事儿，又何必啰唆呢。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艺术的水准跟叙述节奏快慢、细节繁简其实没什么关系，而是跟故事的讲述方式、方向，乃至作家对故事的情感和态度息息相关。同样的故事，千人讲来千般样，故事是无穷无尽的，讲故事也因此成为一

个古老的职业。

记者：谈到生活细节，日常生活在他的小说或散文创作中有怎样的地位？

金仁顺：日常生活是写作的水土啊。小说、散文都是在这块水土中中长出来的，可能是一把水灵灵的小白菜，豆菜里面的几颗豆子；也有可能是伤疤，是刻骨铭心的仇恨；或者是怦然心动的爱情，晦暗不明的暧昧。但真正定位作品坐标的，是作家的世界观。换个比方，如果说作品是作家拿出来的一颗颗丹药，那日常生活是投入炼丹炉里的原材料。作家可以虚构任何天马行空的故事，但越是天马行空，越需要有生活经验打底。

记者：您不仅常常关注朝鲜族女性的命运，其实您的其他小说对女性也有着细腻且不俗的描写。您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女性书写的？

金仁顺：写作的时候我从来没想过我要站在女性主义视角，或者别的什么立场，我考虑更多的是小说的故事、人物，以及如何写好故事以及人物。但作品完成后回头审视，其中有一部分作品还真是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倾向。短篇小说《宥真》中，宥真是“我”的一个韩国诗人朋友，两个人在国际写作营中相识、交往，宥真虽然有才华，却因为她的写作带不来名利，受到丈夫和周围人的轻蔑和嘲笑。只有谈恋爱的时候，她的诗歌才像某种化妆品似的，能让宥真多出一点儿魅力。但即使是这种吸引力，也如过眼云烟，恋情匆促而颓丧，婚姻沉闷而失败，找不到喜欢的工作，以至于宥真挣扎着想：是不是一定要依靠男性，女诗人、女作家才能迈向成功？在小说的最后，不怀好意的文坛大佬终在讨伐声中跌下神坛，而

宥真在平淡孤寂的生活中，与诗歌为伴，贫穷但清高。

这些女性人物都有生活的基底，但又是虚构出来的理想化形象。女性主义一旦融入小说里面，它的骨肉血脉其实也是打碎了糅和进人物和故事中，是混沌、暧昧、矛盾和纠结的。现在分析文本时，她们身上的女性主义成分非常重，但写作时，我关心的是她们最感性的部分。

记者：想必不仅女性身份对您的写作有影响，民族身份也有很大的影响吧？

金仁顺：我接受自己的多重身份，虽然每种划分都难免简单、粗略，但这些划分仍然能够体现出一些共同特质，对作家而言，能多个身份和视角，总会多一些惊喜。不过身份的多样性是外部的，或许能够丰富写作题材，跟作品的深度和思想性却关系不大。好作家和差作家从来不是通过身份的复杂性来决定的，是某些作家写出了让人感动的作品，通过作品回溯到作家身份的种种，这才有意义。

记者：您对短篇小说创作十分擅长，能谈谈您对短篇小说的看法吗？这十年来，您最满意自己的哪部短篇小说？

金仁顺：短篇小说，短的只是形式，其他的要求跟中篇小说甚至长篇小说都是一样的。而且，它注定要更浓缩、更凝练，言有尽而意无穷。我没有“十分擅长”，事实上，写作了这么多年，每次写一个新小说时，仍旧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也谈不上对哪篇小说特别满意，每篇小说都是生活中的某个尖角刺痛了我，从而引发了我写出来的欲望。比如说《小野先生》，是我20多岁时见过的一个日本朋

## 与中国梦同频共振的十年

□钟兆云



我的文学之路起步于学生时代，15岁发表作品，大学时靠稿费维持学业，毕业从事党史工作第二年，写就2万多字的纪实作品《1949：张鼎丞和他的战友们》，在《福建日报》连载后，同行称“为党史界带来一股新风”。受此鼓励，我在当年的中央苏区第一模范区、毛泽东才溪乡调查之地、将军之乡——闽西上杭县才溪乡出版了第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将军与故土》。与此同时，我在家乡闽西武平县深入采访共和国首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的弟弟、失散老红军刘亚东，写出3万字报告文学《空军司令和他的农民弟弟》，继而创作《百战将星刘亚楼》一书，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获得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由是，更坚定了我走一条党史与文学结合之路的决心，用一撇一捺的方块字为开国元勋筑起我的纪念碑，带领读者走进邓子恢、张鼎丞、叶飞、庄希泉、傅连璋、贺敬之、江一真等人的精神世界，并由他们的传记带出无数革命者的事迹。

在为党史人物立传时，我还出版了《国之大殇》《落日——闽台抗战纪实》《商道与人道——塚本幸司传》等报告文学、传记文学以及数部长篇小说。在鲁迅文学院就读时，我还想到要用文学为“三农”立传，于是带上只读了初二便因家贫辍学却热爱写作的农民二姐钟巧云，开启了前后长达8年的“乡村三部曲”写作。东奔西走，常常席不暇暖，我接触到的党史、国史、军事人物及海外人士、国际友人越来越多，了解到的重要事件越来越多，愈发丰富了阅历，积累了对战争与和平、中国与世界的认识，时时涌起创作冲动。2015年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70周年之际，我创作了长篇小说《我的国籍我的血》，并赴台参加书展。此书的

写作为我埋下伏笔，此后花4年时间，以第一人叙述，潜心创作了一部反映旅居美国的侨三代千辛万苦寻根问祖的长篇小说《海的那头是中国》。

这十年中，我当选为福州市作协主席、福建省作协副主席，两次参加全国作家代表大会，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党的十八大以来毫不松懈的铁腕反腐，特别是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让我开始关注反腐题材，并为此接受福建省纪委监委邀请，全过程参加一起省管干部重案调查，和专案组同驻案点百来天，完成了多部反腐题材的作品，也为今后的文学创作储备了素材。

于我的生活和工作经历来说，红色题材、乡村振兴都是我创作的富矿和主旋律，因此更是深入挖掘、精心耕耘，期待能不负这个时代。曾任福建省委书记、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的改革开放先锋、扶贫先驱项南，被习近平总书记称赞为“公仆榜样”，晚年的他默默地奉献出自己的全部光和热，为贫困地区和困难群众撑起了一把“伞”，并以此为“一种快乐”。受他的影响和号召，很多人终身从事扶贫事业，众志成城，助力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有感于此，我写了《项南：一个撑伞的人》一文，上了《新华文摘》的封面要目。而洋洋30万字的《项南——一位省委书记的来来去去》则是给项南百年诞辰的献礼。书名的寓意，一是指项南的背影，他生前灵魂有趣，不同流俗，逝后多年背影依然迷人，许多人谈及他，总不免泪流满面；二是我告诉自己要望其项背，也希望大众如是；三是作灵魂拷问，姑且不论我们不能望其项背，现实中有多少人真心实意想望其项背？

十年来，一书一文作毕，总要抬眼望天，望太阳，看星星，太阳和星星总也在默默地凝视我。一颗心跟着笔下人物的灵魂随风飞扬，深深地感恩他们潜移默化的滋养，让我“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行无愧于人，止无愧于心”。回看我的十年，庶可自豪地说，没有虚掷光阴。人类长河有无数个十年，个人生命中的十年却完全可以用手指头数得过来。无论如何，这个十年于我的人生和创作都不会一闪而过，而值得作为黄金记忆珍藏。2019年，我在微信朋友圈盘点全年某些访谈镜头时，信手写下一句话：“左看右看不过尔尔，几次经历一份记忆罢了。”文学是必须一生朝圣的殿堂，是穷尽一生都难以企及的高峰，今后我还要一如既往地跋涉，绝不能半途止步。

## 十年而得任性的勇气

□梁清散



十多年前，我竟一念之下，就在满大街还都在唱着“北京欢迎你”的歌声下，把工作给辞了，决心去做一名作家。现在回想起来，都不由得心惊肉跳，放在现在，我是万万不敢了。那个鲁莽冲动的自己也许只可能在那个岁数才会出现。当然，很多事就应该在年轻冲动的时候去做，并打破常规。

对于我来说，也许很多事情，不把自己逼到绝境，是没有决心做成的，只是这个绝境从一开始真是挺绝的。在最开始的几年里，虽然我铆足了劲儿去写小说，但和大多数新人作者一样，努力而得的收获却寥寥无几。最惨的一年，整整一年才有2500块的稿费收入，还不是小说而是一篇书评。

幸运的是，在这时，当时还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吴岩老师接纳了我，让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做一些关于科幻的课题研究。我则如此以科幻迷的身份，成为了一个科幻专业旁听生。那时中国的科幻研究才刚刚起步没几年，太多的课题可以让我不再去思考何去何从的问题。从那时起，我就一头扎进了晚清科幻研究里去，这一扎倒是我后来的科幻创作打了一个坚实又有趣的基础。在吴岩老师出版的科幻专著《科幻文学论纲》里，附录上有我整理的《中国近现代科幻小说目录》。日后我所做关于吴岩人《新石头记》版本研究论文，也发表在《清末小说から》这部专门研究中国清朝末年小说创作的学术期刊上。

刚巧是十年前，迎来了我科幻小说写作的起步期。2012年，我发表了一篇搞笑科幻《烤肉自助星》。小说写的是一个倒霉蛋迫降到了一颗炙热的星球上，所幸他的宇航服完好无损，而不幸的是炙热的星球满地是滋滋流油的烤肉，更不幸的是他饿了。《烤肉自助星》发表后收到不少好评，甚至还拿到了当年华语科幻星云奖的网络科幻小说金奖。这一切，对于一个新人写作者来说，着实是莫大的鼓励和认可，也终于让我自己有了些信心，知道自己还算是一个有写科幻小说能力的人。

不过，对于写作者来说，一篇小说的“成功”终究不能代表什么，需要的更是持之以恒的创作。所以接下来，大受鼓舞的我迎来了自己科幻小说创作的一个小高潮。2015年，我迎来了科幻创作的一个转折。

那一年，我在科幻星云网上开了一个专栏，主要讲晚清时期的科幻小说，名叫《散聊科幻》。《散聊科幻》一共有7篇，从中国科幻小说的起源讲起，到晚清时期中国对外国科幻小说的译介，再到本土原创的科幻小说等等多个方面，主要中国早期科幻的状况。虽然《散聊科幻》并不是小说，而是系列科普小文，但因为得了当年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评论金奖，也让我意识到，其实晚清这个我十分熟悉的时代，也是很受欢迎，至少十分感兴趣的。从而，我就开始着手写《新新日报》系列了。

而当开始写《新新日报》的时候，我才发现构思时的我是天真了。《新新日报》在构思的时候，我只是想写一个清朝末年的蒸汽朋克故事。直到动笔来写，才发现那随便几个字的初步

构想，简直处处是坑。我设定的故事发生地是清末上海，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蒸汽机时代，不仅电力已经有了相当的应用，甚至内燃机也初步进入市民的生活，这样的时代还怎么“蒸汽”呢？这一点倒是还算好办，毕竟发电机还是蒸汽机，况且“蒸汽”未必一定就全是蒸汽机，主要是“蒸汽”的审美观在那里就可以。然而，“蒸汽”之外的“朋克”呢？在清末时期，朋克的反叛精神倒也完全不违和。但这并不代表问题解决了，毕竟“蒸汽朋克”这个概念以及审美，和“科幻”一样是完全的舶来品，它一开始的出现就带有强烈的怀念维多利亚时代繁荣的复古感，即使“蒸汽朋克”从英国到了远东日本，实际上还是有太多的怀念过去辉煌岁月的意味。而把这个概念搬到中国来，特别是看似和日本蒸汽朋克作品同时代的晚清，从感受上就大不相同了。毕竟那是一个国家羸弱饱受欺辱内忧外患的时代，一点都不辉煌，不值得去怀念什么。不过，既然已经决定了，还是想在诸多困难中去尝试一把，毕竟我是那个一时冲动就会辞掉工作一心写作的愣头青。而在这种一头扎进去的尝试中，当然还是需要有一定的理性，理性告诉我需要的就是，找到一个新的用“蒸汽”的眼睛看时代的立足点。5年后的我，只希望自己的《新新日报》和第二本《新新日报》找到了这个新的立足点。

在创作《新新日报》系列之余，我确实仍然不甘于只停留在晚清蒸汽朋克这一个范式下，偶有突发奇想：其实很多论文也和一篇推理或者科幻小说一样，需要提出问题，证明问题，得出结论。那么，反过来我可不可以用写论文的方式来写科幻小说呢？

想是这么想的，但总觉得不一定会受欢迎。然而，既然我总会不顾后果地去做个决定，然后付之于行动，那我又怎么会瞻前顾后，所以，这一次也不例外，干脆就任性地写好了。《济南的风筝》就是在这种“任性”的心态下写完的。《济南的风筝》的故事仍然是放在了我熟悉的清末这个时代，不过真正的叙事视角是在现在，是小说主角“我”每日奔走在图书馆、资料档案馆，以及各种网络资料数据库之间，去寻找破案的线索。写的时候，我的状态是十分畅快的，就感觉像是在写将近十年前，在吴岩老师那里，每天埋头在故纸堆中给中国科幻的起源寻找蛛丝马迹的我。而这篇“任性之作”发表之后，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地深受好评，还拿了2019年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短篇小说金奖，实在是更鼓舞了我的“任性”。

从2019年转眼又过去了3年，我还是依旧没有“安分”在自己熟悉的模式下，总忍不住去尝试新的东西，也希望自己能掌握得更多。尝新总是艰辛的，所幸的是，在这几年里，我的作品陆续被翻译到了日本和美国发表，早期那篇《烤肉自助星》还成为了今年日本星云奖海外短篇小说部入围作品，获得了连连不断的认可，更是给予了我相当的信心和鼓舞。而我当然更不会辜负这般源源不断的鼓励，继续勇敢地“任性”下去，毕竟我拥有了来之不易的真正勇气。